

論道光帝廟諱 與古書中「寧」字的寫法

黃一農*、蕭永龍**

〔摘要〕

避諱作為一門考訂史實、辨別年份的學問，從民國至近代以來一直蓬勃發展，而紅學界亦曾從避諱之視角，對各傳世抄本《紅樓夢》進行年份辨別，其中所涉及層面包括道光帝廟諱「寧」字的寫法。然學者對諱字的理解各不相同，或以朝廷頒布的條例為據，認為「寧」或「**寧**」為諱字，或以該字為早已存在之俗體。筆者近從《三希堂法帖》中確認前述諱字為早已存在的俗字，並在資料庫協助下，通過道光及其前後鈔刻本之大量實例，具體呈現單以諱字辨別年份之局限性及可能性。亦即，先前以諱字判斷文本時限的論述，當有重新探究之必要，此文也為避諱學之發展提供一新的角度與高度。

關鍵詞：避諱、旻寧、紅學、《棗窗閑筆》、《春柳堂詩稿》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避諱為中國古代特有之文化現象，涉及層面甚廣，上至帝王、聖賢，下至家諱都涵括其中，它進行的方式繁雜多變，有改詞、變體、缺筆、空字等。¹其作為一門學問，早為學者留意，其中清人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更是史料弘富，然它尚停留在史料集成之範疇中，未遑講究如何運用於文史研究上。²而民國以來，有系統地介紹中國避諱之歷史、方法、種類，並歸納利用它以進行史考的途徑，使它成為疏通文獻、考證史實、判斷年份、鑒定真偽的重要學問，實始於陳垣《史諱舉例》。³

近代以來，避諱之研究持續發展，⁴而紅學界亦曾從諱字之角度，進行探討。學者曾討論可否從傳世《紅樓夢》抄本中的避諱寫法，判斷其抄成年代，如劉世德教授以「眉本」（卞藏本）或其底本在康熙、乾隆、道光三朝的避諱進行年份辨別，並以「書中多次出現的『寧』字並不避諱」，推斷該書繕寫於道光之前。⁵劉廣定教授也曾以清朝所頒之諱例出發，認為「寧」或「寧」為「寧」字在道光間的避諱，進而提出石頭記「己卯本」為當時之抄本，⁶然亦有學者認為相關文字並非避諱，而是傳統的俗寫字，如沈治鈞教授提及紅樓夢蒙古王府本中大量的「寧」字，多作「寧」，偶作「寧」，認為那是正體「寧」字的簡寫和俗寫，並提及避道光帝諱的標準寫法「甯」或「寧」在這個本子見不著。⁷

¹ 避諱之對象與用法，詳見王新華：《避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32-76、169-200。

² 詳見范志新：《避諱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年），頁i-ii。

³ 周少川：〈陳垣的避諱學研究——論《史諱舉例》的歷史文獻學價值〉，《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頁16-20。

⁴ 關於避諱學之研究論著，詳見范志新：〈避諱學論著論文索引〉，《避諱學》，頁415-430。

⁵ 劉世德：《紅樓夢眉本研究》（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12-14。

⁶ 詳見劉廣定：〈「己卯本」與「蒙府本後四十回」抄成時期考〉，《紅樓夢研究》，出版中。

⁷ 沈治鈞：〈蒙古王府本《石頭記》遞藏史述聞〉，《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25。另外梅節先生也提及相關文字為民間流行的簡體俗字，並列舉了《宋元以來俗字譜》為例。梅節：〈評劉廣定先生《紅樓夢抄本抄成年代考》——兼談《紅樓夢》版本研究中的諱字問題〉，《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2輯，頁237-240。另可兼看徐乃為：〈「脂批晚出說」再商兌——兼與劉廣定先生的避諱說商榷〉，《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3輯，頁137-149。

由於紅樓夢傳世抄本多為「過錄本」，故判斷其抄寫年份為重要課題。再者學者對「寧」字之避諱也有不同看法，故本文擬就「寧」字進行論述，期許能對以避諱判別年份之探討有所裨益。筆者將以道光間刊刻之書籍作為實例討論，並分作三個角度，首先以官書《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為例，該書為道光帝所重視，於十二年更「頒賞皇四子、皇五子、王公大臣、內廷翰林、各省督撫……各一部」。⁸接著則檢視由地方官與當地文人所主導的方志，該類書籍刊刻年份清楚，普遍顯示文人實踐狀況。最後再以書坊通俗出版物為例，筆者在此特選用小說作為分析，主因此類書籍銷售對象多趨向大眾，故通常大量出版，校刻不精，從以上各層面分析正可見避諱施行之實況。

之前，學者要通過實例進行探討，往往局限於效率，須先確定該書的刊刻年份，並就一部部書從頭翻閱至尾，對其中出現的「寧」字作一統計考察，所耗費的時間過長，或需數年才能完成。此外，尚涉及對俗體字發展歷程的了解，道光諱字前是否已存在相關俗體字？如前已有，那麼單以之判斷年份是否合適？

雖有種種局限，然而在 e 考據的時代，通過中國方志庫、中國基本古籍庫等資料庫對「寧」字的搜索，讓我們得以短時間內把大量實例整理出來。中國方志庫除了將該刻鈔本之刊傳年份清楚列明外，更把原本之影像附載於旁，讓讀者能清楚地對照其字體寫法。至於中國基本古籍庫，雖未列刻鈔本之原圖，使查找過程較不方便，但從其出現之卷數與前後文，加以紙本實字對照，還是能確定相關諱字寫法。而俗體字的狀況，通過乾隆年間編次的《三希堂法帖》也可窺探一二。該帖收錄魏至清初之書法作品，從中可發現「寧」在道光廟諱前，該俗體寫法已經存在（圖一）。

因此本文將先從朝廷規章談起，以明當時避諱之用法，接著以道光間刻本為實例，說明制度與實踐上的情形，並通過道光前後之刻本顯示以避諱與否進行年份判斷之侷限，最後再以《棗窗閒筆》與《春柳堂詩稿》為實例，述說以諱字辨別年份之方法。

⁸ 詳見《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代其餘各朝實錄均同此本），卷215，道光十二年七月上，頁186。

二、道光帝廟諱與古書中的「寧」字寫法

據劉廣定教授於〈「己卯本」與「蒙府本後四十回」抄成時期考〉一文的勾勒，可知嘉慶帝於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崩後，甫登基之旻寧就於八月初十日諭旨曰：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恭奉皇祖高宗純皇帝諭旨：「綿字為民生衣被常稱，尤難迴避，將來繼體承緒者，當以綿作旻，則係不經用之字，缺筆亦易。等因欽此。」今朕欽遵成命，將御名上一字敬改，至臣下循例敬避，上一字著缺一點，下一字將心字改寫一畫一撇，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毋庸追改。⁹

其後肅親王永錫等雖旋即奏請將御名下一字改成音義相通的「甯」字，但得旨不改，¹⁰而是將「旻」字字根中的「文」缺頭點，並將「寧」字字根中的「心」寫成一畫一撇的「寧」字。

而同治本《重校字學舉隅》中，記敬避宣宗廟諱旻寧之方式曰：

上一字《爾雅》「秋為○天」，敬缺中點作「旻」，下一字《易》「萬國咸○」，敬改作「寧」。二字雖奉諭旨，究不敢用。近日刻書行之有用「甯」字代者，場屋不可代用。¹¹

⁹ [清]崑岡等修，[清]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石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344，頁427。

¹⁰ 《宣宗成皇帝實錄》，卷2，嘉慶二十五年九月下，頁98-99。

¹¹ 本文原擬用道光年間之刊本以增強論述，據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資料顯示，該館藏有道光庚子年重刊本（下稱台大本），然經筆者翻閱內文後，發現該書所收「敬諱」字樣，另有清穆宗的避諱，寫法也與前不同。前每個皇帝始句都冠上其諱號，如宣宗、文宗，但此處卻只用「皇上」二字，可知其為穆宗同治間刻本。筆者另對照了該館所藏同治甲戌（1874）湖北崇文書局重雕版，發現該書與台大本所收序文次序相同，而且兩者之版心都寫上「敬避字樣」與「馮承熙書」，頁碼也同為頁3，可見兩者版本之相似。然內文卻有些許不同，如「近日刻書行之有用甯字代替者」句，甲戌本「之」改作「文」。從甲戌本重雕與改字的情況觀之，台大本很可能為更早的版本。另台大本與甲戌本所收〈重

可知當時雖奉有明旨將「寧」寫作「寧」，但民間有些人終不敢用，而改寫成「甯」，然在科考時，則仍得遵循官方頒布之諱例。至咸豐四年始又諭曰：「嗣後凡遇宣宗成皇帝廟諱，缺筆寫作『寧』者，悉改寫作『甯』」。¹²亦即，從嘉慶二十五年八月起，「寧」的法定避諱字為「寧」或「寧」，至咸豐四年起改用「甯」。

但制度與實況是否相符呢？比對道光間官書如《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發現其卷一至卷八十共 171 個「寧」字都避諱，沒有一個寫作「寧」，但所用字體並未統一，其中「寧」字使用率最高，共可見 155 個（91%），「寧」字則有 12 個（7%），至於「甯」則都為姓氏，有 4 個（2%）。¹³

筆者對地方志則選用來自不同地域、年份的著作，第一為道光十一年陝西《褒城縣志》抄本，裡頭用字中有少數「寧」字寫作「寧」（詳見圖二），為直接一筆劃下，然該字與「寧」相似，故歸入其中統計，得出該書 92 個「寧」字全寫作「寧」。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其一為抄寫者書寫上的習慣，其二為避道光皇帝的諱（至於應當如何判別，詳見後文《棗窗閒筆》的例子）。而道光十五年山東《長清縣志》刻本亦與《褒城縣志》相似，該書有 89 個「寧」字，佔 97%，而「甯」字只出現三次。另外《長清縣志》出現上部只一橫少一撇的「寧州」和「寧陵」兩字，兩者與「寧」相似，故歸入其中計算。

最後則是道光四年湖南的《鳳凰廳志》，該書中有兩字不清，應當為「寧」而非「寧」，另尚有上缺一橫和上缺一撇的「寧」字，由於兩者相似故歸入其中統計（詳見圖二）。《鳳凰廳志》與前兩方志相同，都以「寧」為主要用字，共有 80 個（94%），然該書尚未如前兩書般用字統一，尚出現三次「寧」。無論如

校字學舉隅序〉雖內容相似，但甲戌本序文完後，所錄為「錢塘程恭壽識」，「稷山王文在書」兩句，並各鈐印兩枚。而台大本則在序文結束後，加上「辛未二月」四字，且在「識」後，另有「宛平」二字，筆者推敲後文當記此文為何人所書，然因破損，難以再見。但從年份判斷，台大本當早於甲戌本，並很可能是同治十年辛未間所刊。另日本藏之光緒五年本也寫作「行文」，可知此文為後出之版本所沿用，詳見〔日〕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昭和五十八年），別卷 1，頁 304。經上文推斷，台大本當為筆者能見之較早版本，故用此本引文。

¹² 〔清〕崑岡等修，〔清〕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344，頁 427。

¹³ 另道光間《褒城縣志》與《長清縣志》所出現的「甯」都為姓氏，唯有《蘊懷閣文集》出現的「甯」非姓氏，可見諱字還是以「寧」或「寧」為主。

何，三個來自道光間不同地域和年份的方志都未見「寧」字出現，可見具官方性質的方志大體遵守諱字。

對比士人著作，大致符合前述情況，例如盛大士所著《蘊縵閣詩集》、《蘊縵閣文集》與《蘊縵閣別集》，亦以「**寧**」字寫法居首，共 22 個（96%），並有一個「甯」（4%）。至於坊刻本則相對較不嚴謹，在道光三年重鑄之《繡像北宋金槍全傳》的 34 個「寧」字裡，共 31 個「**寧**」、1 個「寧」、2 個「甯」。該兩個無避諱的「寧」，或許是刻工在重鑄時的疏忽。比對表一中雍正至道光間「寧」字的使用，發現它們多以字根帶心的「寧」字為主，如道光間書坊不遵守諱字，該「寧」字書寫樣式應不會急速下降，可見當時對避諱是相當重視的。

除了《繡像北宋金槍全傳》外，筆者還對照道光十八年重鑄的《林蘭香》，發現該書正文所出現的 51 個「寧」字裡，有 40 個作「**寧**」，10 個作「寧」，只出現 1 個「甯」字，後者應當亦為誤刻所致。¹⁴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沈治鈞教授所說的「真正」避諱字「甯」或「甯」，實際上與典章規定和具體範例皆不符，該兩字出現的情況不多，相反地，被他誤認為俗體字的「寧」與規章上的「**寧**」字則大量出現。通過上文分析，顯現制度與實踐大致相符，道光朝多使用「**寧**」或「寧」以避皇帝之名諱。

表一：雍正至同治間「寧」字的使用概況

書名	年份	文字出現次數					
		寧	寧	甯	寧	寧	寧
《連平州志》 ¹⁵	雍正八年	10	69	27	42	0	0
《安縣志》 ¹⁶	乾隆四十五年	16	0	0	0	0	0
《海康縣志》 ¹⁷	嘉慶十七年	0	52	0	92	0	0
《茶陵州志》 ¹⁸	嘉慶十八年	3	35	0	54	9	0
《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 ¹⁹	道光年間	155	12	4	0	0	0

¹⁴ 詳見〔清〕隨緣下士編輯，〔清〕寄旅散人批點：《林蘭香》，道光十八年戊戌重鑄，本衙藏板。htt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D8663000&order=rn_no&no=04550。

《蘊懷閣詩集》、《蘊懷閣文集》、《蘊懷閣別集》 ²⁰	道光元年、五年、六年	0	22	1	0	0	0
《繡像北宋金槍全傳》 ²¹	道光三年	1	31	0	2	0	0
《鳳凰廳志》 ²²	道光四年	3	80	2	0	0	0
《褒城縣志》 ²³	道光十一年	0	92	0	0	0	0
《長清縣志》 ²⁴	道光十五年	0	89	3	0	0	0
《平山縣志》 ²⁵	咸豐四年	0	0	4	0	0	71
《瓊山縣志》 ²⁶	咸豐七年	0	214	15	0	0	2
《番禺縣志》 ²⁷	同治十年	9	0	386	0	0	0

上表顯示道光以前「寧」字之用例相當高，但至道光以後就甚少出現，可知其與宣宗廟諱相關。另外在咸豐四年頒「宣宗成皇帝廟諱……悉改寫作『甯』」諭旨之後，該諱字也未見統一，如咸豐七年的《瓊山縣志》就有 214 個「寧」作「甯」，顯示制度與實踐上的落差，更進一步說明單從法令著手，很可能導致判斷上的錯誤。總前所論，發現官書、士人、方志以及坊刻本都相當重視避諱，然因種種因素，書中偶亦出現誤刻之例。如逕以該諱字判斷年份，就可能犯錯。

¹⁵ [清] 盧廷俊修，[清] 何深、[清] 顏希聖纂：《連平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雍正八年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3 年）。另書中有三個「甯」為姓名，一併計入統計。

¹⁶ [清] 張仲芳纂修：《安縣志》（《故宮珍本叢刊·四川府州縣志》景印乾隆五十四年嘉平月刻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

¹⁷ [清] 劉邦柄修，[清] 陳昌齊纂：《海康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嘉慶十七年刻本）。

¹⁸ [清] 趙國宣修，[清] 尹勳增纂：《茶陵州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景印嘉靖十八年刻本，北京：中國書店，1992 年）。

¹⁹ [清] 曹振鏞等撰：《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道光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另外相關「寧」字裡有四個寫作「甯」，然整體上類似「寧」字，故歸入其中計算。

²⁰ [清] 盛大士：《蘊懷閣詩集》（道光元年刻本）。盛大士：《蘊懷閣文集》（道光六年刻

道光帝登基後，大家敬避帝名的方式雖以「寧」字居多，但亦有用「寧」、「甯」者，或是將「寧」字缺末筆，然「寧」或「寧」其實早為古人所用，觀《三希堂法帖》中所收歷朝書法作品以及「中國方志庫」中不同時代版本的方志，可發現改心字為一畫一撇以及將「寧」字缺末筆的寫法，均為道光朝前已存在的俗字，當中又以「寧」字較多。另據《說文解字》：「寧，安也。从『宀』，『心』在『皿』上」，段玉裁注曰：「此安『寧』正字，今則『寧』行而『寧』廢矣」。²⁸可知「寧」或「寧」字的寫法其實與諱例缺筆無關，而是「寧」字的正體，相反地，今使用的「寧」字，在漢代時為異體字。

再者從表一及圖二、三可知道光前刻本多出現「寧」、「寧」、「甯」、「寧」混用的情況，但道光後則甚少再出現「寧」字，知避帝諱確為多數人嚴格遵守。²⁹另以乾隆五十四年《安縣志》為例，全書共出現「寧」字十五次，全刻作

本)。盛大士：《蘊懷閣別集》（道光五年刻本）。以上書籍均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²¹ 該書另有三字與「寧」字相似（詳見圖二），故歸入其中計算。詳見〔明〕江寧研石山樵訂正，〔清〕駕湖廢閣主人校閱：《繡像北宋金槍全傳》，道光三年癸未重鐫，博古堂梓行（扉頁書名為《繡像金槍演義》，本文使用卷首書名，詳見附錄圖六）。htt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D8642000&order=rn_no&no=04527&im=0010002_1&pg=2。

²² 〔清〕黃應培修，〔清〕孫均銓、〔清〕黃元復纂：《鳳凰廳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道光四年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²³ 〔清〕光朝魁纂修：《襄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道光十一年抄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²⁴ 〔清〕舒化民修，〔清〕徐德城纂：《長清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道光十五年刻本）。

²⁵ 書中有一個「宁」及兩個「甯」為姓名。

²⁶ 〔清〕李文恒修，〔清〕鄭文彩纂：《瓊山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咸豐七年刻本）。書中另有三個「甯」為姓名。

²⁷ 〔清〕李福泰修，〔清〕史澄、〔清〕何若瑤纂：《番禺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同治十年刻本）。另書中有三十三個「甯」字為姓名。

²⁸ 詳見〔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50。〔漢〕許慎著，〔清〕段玉裁註：《說文解字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39。

²⁹ 筆者此處查看的方志涵括表一乾隆至同治間刻本，以十來部書中千多個「寧」字為例，不避諱的情況只有表一所呈現的數次而已，故筆者合理推斷此時相關避諱已經定型，「寧」字已絕少使用。

熙寧	卷一頁三	熙寧	卷一頁三	熙寧	卷一頁三
建寧	卷七頁六	建寧	卷七頁六	建寧	卷七頁六
長寧	卷二頁四十一	長寧	卷二頁四十一	長寧	卷二頁四十一
寧夏	卷十六頁十六	寧夏	卷十六頁十六	寧夏	卷十六頁十六
建寧	卷十二頁三十四	建寧	卷十二頁三十四	建寧	卷十二頁三十四
常寧縣	卷三頁四十七	常寧縣	卷三頁四十七	常寧縣	卷三頁四十七
建寧府	卷六十二頁六	建寧府	卷六十二頁六	建寧府	卷六十二頁六
熙寧	卷三十二頁二十四	熙寧	卷三十二頁二十四	熙寧	卷三十二頁二十四
寧化縣	卷三頁二十三	寧化縣	卷三頁二十三	寧化縣	卷三頁二十三
明弘治四年《八閩通志》		明弘治四年《八閩通志》		明弘治四年《八閩通志》	
嘉慶十七年《海康縣志》		嘉慶十七年《海康縣志》		嘉慶十七年《海康縣志》	
建寧	卷一頁二十四	建寧	卷一頁二十四	建寧	卷一頁二十四
建寧	卷一頁三十八	建寧	卷一頁三十八	建寧	卷一頁三十八
寧鄉	重刊序頁一	寧鄉	重刊序頁一	寧鄉	重刊序頁一
輯寧我宇	卷二頁二	輯寧我宇	卷二頁二	輯寧我宇	卷二頁二
宗寧寺	卷十頁七	宗寧寺	卷十頁七	宗寧寺	卷十頁七
海寧	卷十五頁七	海寧	卷十五頁七	海寧	卷十五頁七
江寧	卷十五頁三十六	江寧	卷十五頁三十六	江寧	卷十五頁三十六
歐寧	卷十六頁十	歐寧	卷十六頁十	歐寧	卷十六頁十
咸豐四年《平山縣志》		咸豐四年《平山縣志》		咸豐四年《平山縣志》	
永寧	卷一頁十二	永寧	卷一頁十二	永寧	卷一頁十二
建甯	卷四頁十六	建甯	卷四頁十六	建甯	卷四頁十六
咸豐四年《興義府志》		咸豐四年《興義府志》		咸豐四年《興義府志》	
寧斗	卷四十二頁二十五	寧斗	卷四十二頁二十五	寧斗	卷四十二頁二十五
永甯州	卷四十五頁二十二	永甯州	卷四十五頁二十二	永甯州	卷四十五頁二十二
咸豐七年《瓊山縣志》		咸豐七年《瓊山縣志》		咸豐七年《瓊山縣志》	
建甯	卷一頁四	建甯	卷一頁四	建甯	卷一頁四
乾寧	卷一頁六	乾寧	卷一頁六	乾寧	卷一頁六
天寧寺	卷二十一頁十四	天寧寺	卷二十一頁十四	天寧寺	卷二十一頁十四
同治十年《番禺縣志》		同治十年《番禺縣志》		同治十年《番禺縣志》	
寧武	卷九頁六	寧武	卷九頁六	寧武	卷九頁六
熙寧	卷十五頁四	熙寧	卷十五頁四	熙寧	卷十五頁四
永寧	卷十九頁二十五	永寧	卷十九頁二十五	永寧	卷十九頁二十五

圖三：「中國方志庫」中各朝版本裡的「寧」字。³⁰

³⁰ 各書均儘量列出所有「寧」字的寫法，但「甯」字用於姓氏時則略。為免重複，此處不列舉道光間「寧」字之使用，詳見圖二。上表之資料除出自表一方志外，尚有〔明〕黃

三、諱字的辨別——以《棗窗閒筆》與《春柳堂詩稿》為例

正如上文所述，我們不能單從諱字判斷書籍之撰寫刊刻年份，但如能掌握作者的書寫習慣，我們仍有機會推斷其刊抄時限。紅學研究中引發不少爭端的裕瑞《棗窗閒筆》，提供我們一個相當好的例證。先前有學者曾從《棗窗閒筆》中 8 個「寧」字的寫法，判斷其抄寫之時間下限，如趙建忠先生認為「《棗窗閒筆》不避道光帝『寧』字諱，故成書下限應在嘉慶二十五年前」，³¹但此說值得斟酌，實際上《棗窗閒筆》的寫法正與道光諱字相符。故通常我們無從判斷此為俗體字，還是因避諱所致。

很幸運地，裕瑞之書多是其親自手寫精刻，且嘗被許為「刻梓精好，諸家題跋並鉤摹筆迹如新脫手」。³²而清楚註明為裕瑞「自錄」的，就包含《清豔堂近藁》、《眺松亭賦鈔》、《草檐即山集》、《棗窗文藁》、《瀋居集詠》、《東行吟鈔》、《棗窗文續藁》（又名《再刻棗窗文藁》）等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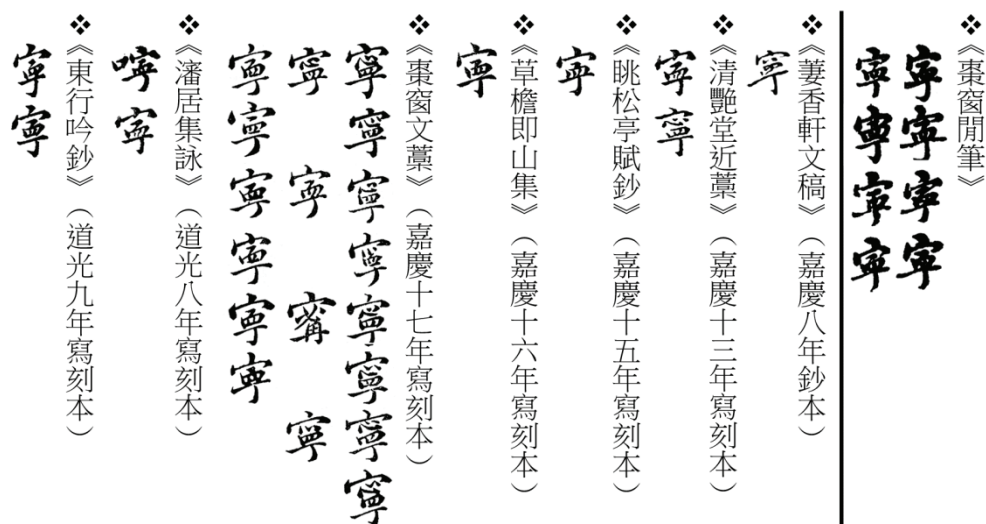
從裕瑞在嘉慶十三年所寫刻《清豔堂近藁》與嘉慶十七年《棗窗文藁》中的「寧」字寫法，發現有過半是隨性寫成「寧」、「寧」、「寧」、「甯」等俗體，然而道光後《棗窗閒筆》、《瀋居集詠》、《東行吟鈔》中的 12 個「寧」字，則全寫作「寧」或「寧」。從其前後書寫習慣之改變，可知《棗窗閒筆》之所以全以諱字的方式書寫，應為遵循官方所規定之諱例。對當時仍在圈禁中的裕瑞而言，他應更懂得自我約束（他在「自錄」諸書中均嚴避前朝之帝名）。³³亦即，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棗窗閒筆》最可能抄於道光帝即位之後。

仲昭纂修：《八閩通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景印明弘治四年刻本，北京：書目文獻，1988 年）。〔清〕張奇勛、〔清〕譚弘憲、〔清〕周士儀纂修：《衡州府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景印康熙十年刻本）。〔清〕張鏞修，〔清〕鄒漢勛、〔清〕朱逢甲纂：《興義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咸豐四年刻本，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

³¹ 趙建忠：〈清人裕瑞書齋名“萋香軒”誤刻“淒香軒”釋疑——兼談《棗窗閒筆》的稿本筆跡問題〉，《紅樓夢學刊》2012 年第 5 輯，頁 53。

³² 〔清〕楊鍾義：《雪橋詩話》（景印癸丑季冬南林劉氏求恕齋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卷 9，頁 49。

³³ 宗人府永遠圈禁宗室覺羅內，敏雲、舒喜俱著加恩釋放，圖克坦、裕瑞、景祚、碩海俱著照舊圈禁。詳見《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之五，嘉慶二十五年九月下，頁 137。

圖四：裕瑞各「自錄」書中之「寧」字。³⁴

再舉一例，胡鐵岩先生曾就宜泉《春柳堂詩稿》（此書同樣在紅學圈引發爭論）中各詩歌之撰寫年份進行考證，他發現〈鳳鳴於九皋〉中的「泓」未缺末筆，故認為此書未避乾隆廟諱。再從書中的「濼」、「寧」兩字不用「規範」的「寧」，³⁵且又不避咸豐帝奕訢之名諱（《詩稿》中出現的「佇」、「紘」均未缺末筆），進而推斷《詩稿》寫作時間應橫跨乾隆至道光間（作者強調該「寧」字與缺末筆之「泓」字在乾隆時人敦誠的《四松堂集》中嚴格遵守），³⁶並認為《詩稿》是按照宜泉道光間完成的原稿刊刻，故沒有對《詩稿》中後代皇帝的名字進行諱改。

然此說值得商榷，因通常開雕均應遵守當時的廟諱才對，胡氏也未解釋為何書中的「泓」字末筆應缺而未缺。再者乾隆年間刊刻之書籍確實多以缺末筆之「泓」字居多，而高宗自身也強調其「廟諱御名」與「偏旁字畫」相同者，應仿前之「石

³⁴ 關於裕瑞與《棗窗閑筆》真偽的問題，可參黃一農：〈裕瑞《棗窗閑筆》新探〉，《文與哲》第24期（2014年6月），頁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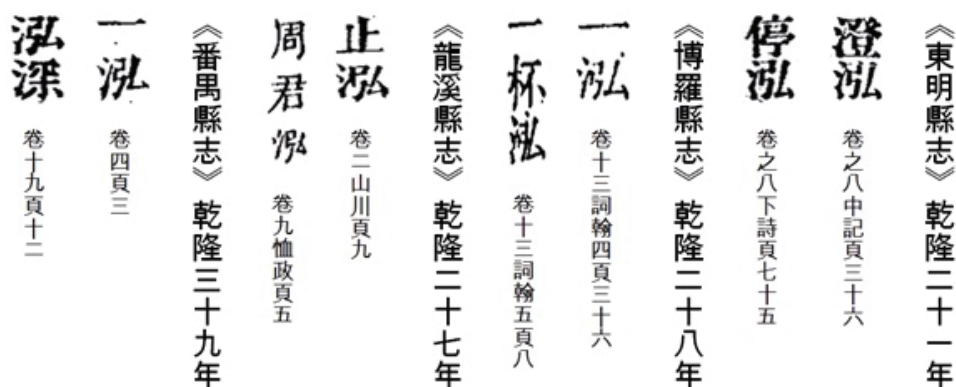
³⁵ 作者原文之「寧」寫作「寧」，但筆者翻看《春柳堂詩稿》後發現，該字實為下缺一橫之「寧」字，猜想作者原意為「寧」，故改之。詳見〔清〕宜泉：《春柳堂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57、107。

³⁶ 詳見胡鐵岩：〈張宜泉《春柳堂詩稿》寫作時間四證〉，《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頁3-4。

經刊本，俱係缺筆」，³⁷惟在實踐上也有未缺末筆者（圖五），故不能單以「泓」字缺不缺末筆判斷其寫作橫跨年份。

或由於，乾隆帝在即位之初，就曾強調「避名之說，朕向不以爲然」。³⁸故在多屬官書性質的方志裡，也往往發現未全盤依據諱例，如《東明縣志》全書三個「泓」字，《龍溪縣志》全書五個「泓」字中的四個都未缺末筆，知「偏旁字畫」的廟諱之避，似未如想象中嚴格。至於敦誠《四松堂集》之所以嚴格使用缺末筆之「泓」字，並把「弘」改作「宏」，則或與其身份地位相關。此因敦氏兄弟爲阿濟格五世孫，在政治鬥爭失敗下，阿濟格一家遭革除宗籍，其後他們雖在乾隆年間被恢復身份，但敦誠在文字的運用上仍戒慎小心，免授人以柄。

另，《詩稿》中以「濤」之右偏旁字根爲心的寫法，亦與規定不符。至於「寧」字寫法，正如前文所述，在諱字前已存在，故可知先前學界以此書避乾隆、道光諱之說，並不能成立。



圖五：乾隆間各方志未缺末筆之「泓」字寫法。³⁹

³⁷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31，乾隆三十年閏二月下，頁 47。

³⁸ 同前註，卷 842，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上，頁 246。

³⁹ [清]儲元升纂修：《東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一年刻本）。[清]陳裔虞纂修：《博羅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乾隆二十八年刻本）。[清]吳宜燮修，[清]黃惠、[清]李疇纂：《龍溪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七年刻本）。[清]任果等修，[清]檀萃等纂：《番禺縣志》（《故宮珍本叢刊·廣東府州縣志》景印乾隆三十九年刻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

四、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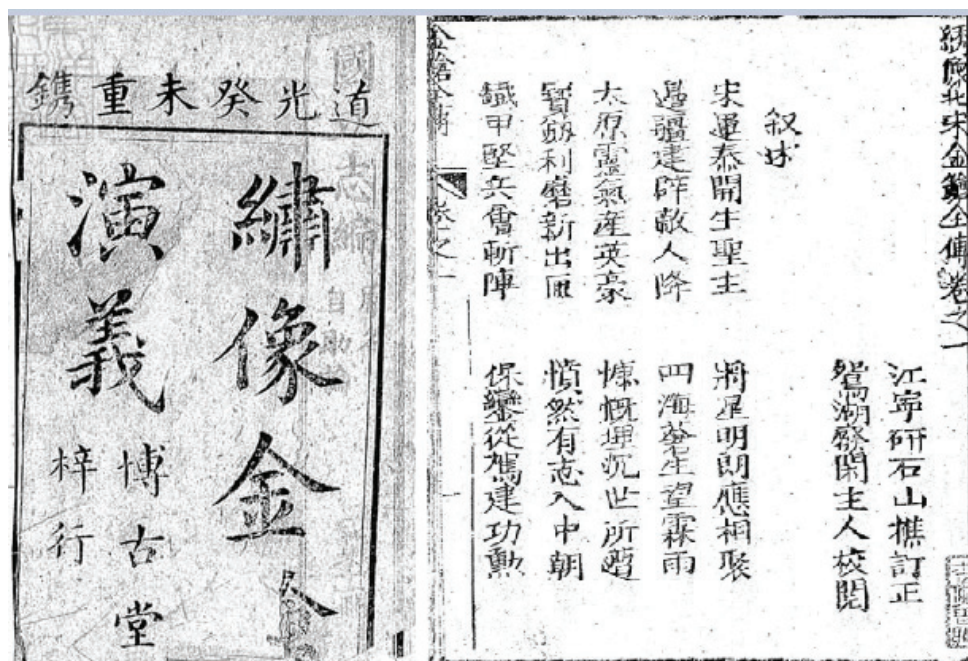
本文先以道光間刻本之實例，對「寧」字的使用概況作一討論，發現相關避諱多書作「寧」或「**寧**」。進而查考《三希堂法帖》，得知「寧」或「**寧**」之寫法，為早在道光前即已存在的俗體字。以乾隆五十四年的《安縣志》為例，全書的十五個「寧」全刻作「寧」，若只依據諱法，把它當做避道光帝廟諱處理，則將誤判刊刻年份。而前文有關《棗窗閒筆》與《春柳堂詩稿》之個案研究，則說明了使用避諱以辨別年份之法的局限與方式，唯有通過對抄寫者或刻工前後書寫習慣的掌握，且將其身處環境納入考量，才有機會判斷該書是否進行避諱。

也就是說，通過諱字判斷《紅樓夢》之傳抄年份，未必可行，抄寫者即使用了「寧」或「**寧**」字，也不必然代表他是為避道光的名諱。再者，乾隆帝雖曾下令「偏旁字畫」中的「弘」字須缺末筆，但在實際範例中，與官方性質甚重的地方志也未見嚴格遵守。

本文雖只著重以道光朝之「寧」字進行探究，然推而廣之，則先前文史工作者以諱字判斷年份、鑒定真偽的論述，實存在許多可商榷之處。

簡言之，清代避諱始於雍正朝，此後之清代文獻大致會敬避所有規定之廟諱字（否則可能獲罪），但對帝名該如何迴避或偏旁字是否得避，則不那麼嚴謹；亦即，官方的規定僅被視為參考，而此文所用的工具與方法，應可提供避諱研究一重要典範。

附錄：



圖六：《繡像北宋金槍全傳》扉頁與卷首頁。

引用文獻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王新華：《避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廣東府州縣志》景印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 光朝魁纂修：《褒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道光十一年抄本。
- 江寧研石山樵訂正，鴛湖廢閑主人校閱：《繡像北宋金槍全傳》，道光三年癸未重鐫，博古堂梓行 htt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D8642000&order=rn_no&no=04527&im=0010002_1&pg=2。
- 吳宜燮修，黃惠、李疇纂：《龍溪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 李文恒修，鄭文彩纂：《瓊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咸豐七年刻本。
- 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瑤纂：《番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同治十年刻本。
- 沈治鈞：〈蒙古王府本《石頭記》遞藏史述聞〉，《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25。
- 周少川：〈陳垣的避諱學研究——論《史諱舉例》的歷史文獻學價值〉，《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頁16-20。
- 宜泉：《春柳堂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胡鐵岩：〈張宜泉《春柳堂詩稿》寫作時間四證〉，《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頁3-4。
- 范志新：《避諱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年。
- 徐乃為：〈「脂批晚出說」再商兌——兼與劉廣定先生的避諱說商榷〉，《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3輯，頁137-149。
- 崑岡等修，劉啓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石印本。
- 張仲芳纂修：《安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四川府州縣志》景印乾隆五十四年嘉平月刻本。

- 張奇勛、譚弘憲、周士儀纂修：《衡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景印康熙十年刻本。
- 張鎡修，鄒漢勛、朱逢甲纂：《興義府志》，成都：巴蜀書社，《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咸豐四年刻本。
- 曹振鏞等撰：《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道光刻本。
- 梅節：〈評劉廣定先生《紅樓夢抄本抄成年代考》——兼談《紅樓夢》版本研究中的諱字問題〉，《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2輯，頁237-240。
- 盛大士：《蘊棧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道光元年刻本。
- _____：《蘊棧閣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道光五年刻本。
- _____：《蘊棧閣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道光六年刻本。
-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_____著，段玉裁註：《說文解字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陳垣：《史諱舉例》，收入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陳裔虞纂修：《博羅縣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 舒化民修，徐德城纂：《長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道光十五年刻本。
- 黃一農：〈裕瑞《棗窗閑筆》新探〉，《文與哲》第24期，2014年6月，頁1-24。
- 黃仲昭纂修：《八閩通志》，北京：書目文獻，《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景印明弘治四年刻本。
- 黃應培修，孫均銓、黃元復纂：《鳳凰廳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道光四年刻本。
- 楊鍾羲：《雪橋詩話》，北京：文物出版社，景印癸丑季冬南林劉氏求恕齋本。
- 趙建忠：〈清人裕瑞書齋名“萋香軒”誤刻“淒香軒”釋疑——兼談《棗窗閑筆》的稿本筆跡問題〉，《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5輯，頁53。
- 趙國宜修，尹勳增纂：《茶陵州志》，北京：中國書店，《稀見中國地方志叢刊》景

印嘉靖十八年刻本。

劉世德：《紅樓夢眉本研究》，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13年。

劉邦柄修，陳昌齊纂：《海康縣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嘉慶十七年刻本。

劉廣定：〈「己卯本」與「蒙府本後四十回」抄成時期考〉，《紅樓夢研究》，出版中。

盧廷俊修，何深、顏希聖纂：《連平州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雍正八年刻本。

隨緣下士編輯，寄旅散人批點：《林蘭香》，道光十八年戊戌重鐫，本衙藏板。

htt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D8663000&order=rn_no&no=04550。

儲元升纂修：《東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昭和五十八年。

Studies on Words of Taboo of Daoguang Emperor and the Writing Style of “Ning”

Huang, Yi-long*, Teow, Yong-long**

[Abstract]

The *Words of Taboo*, commonly used as a way to identify the exact history as well as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of certain books, has been appli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example, in studies of *The Story of the Red Chamber*, *Words of Taboo* has been used to identify the exact year of manuscripts that employ the writing style of *Daoguang Emperor Taboo*. However, due to interpretations by various researchers, different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Some researchers hold that “ning” (寧) or “ning” (寧) as *Words of Taboo* are based on the order denoted by the Imperial System, while other researchers maintain that *Words of Taboo* pre-date the time of the Daoguang Emperor. Based on recent research, the author has confirmed that the “ning” writing style had been used long before the Daoguang Emperor in *San xi tang Fa tie*. Research using a database, and by studying the writing style of “ning” (寧) in books before and after the Daoguang Emperor, has shown the limitations of using an *Words of Taboo* to confirm the year in which a book was published. Thus, research based on the study of *Words of Taboo*, must be re-investigated and revised.

Keywords: Words of taboo, Min Ning (Daoguang Emperor),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Red Chamber*, *Zaochuang Xianbi*, *Chunliutang shigao*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Master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